



13 | 杨建军

常州
“星星”爸自费办自闭症学校

如果自闭症孩子是来自星星的孩子，他就是守护这些孩子的爸爸。

常州天喜儿烘焙坊里，16岁的剑剑在做饼干，妈妈冷慧满心欢喜地看着。10年前，儿子还是中重度自闭症患者，如今不仅能做饼干，还会画画、打架子鼓。冷慧说，这一切的改变，都归功于“引领人”杨建军。

1998年12月，杨建军的儿子涵涵出生。慢慢地，杨建军发现儿子有些特别，“别人家同龄的孩子都会说话了，可他从来没说过一声。”

2003年，杨建军的儿子涵涵被查出重度自闭症。心急如焚的杨建军先将涵涵送到南京一家康复机构训练一年，之后辗转到青岛一家康复中心。

为了让儿子更好地康复训练，2006年3月，杨建军毅然辞去工作，投入全部积蓄，创建公益性康复治疗机构——常州天爱儿童康复中心，并立下誓言“天爱永远做公益”。之所以给学校取名“天爱”，杨建军表示希望儿子以及其他自闭症患者，“天天都有人关爱”。

2006年年底，建校还未满一年，就已接收了近40名学生。由于场地问题，那时已经无法开展教学了。在政府部门支持下，天爱先后开设了勤业校区、西直街校区和电子新村校区。从最初5个学生，到如今3个校区160多名学生，杨建军成了这些“星星的孩子”的守护者。今年9月，他筹建的全国首家大龄自闭症职业技术学校就将投入使用。



14 | 杨新明等

南通
好战友替烈士尽孝

32年来，从前线归来的战士们一直坚守着当年的诺言，把18位烈士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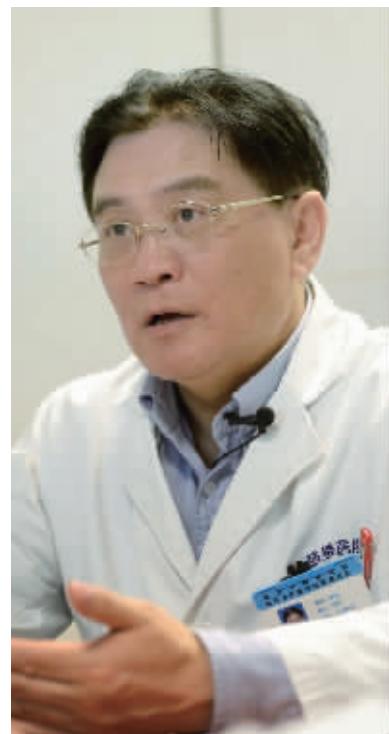
88岁的刘德和老人住院了，轮流守在病床前的，除了他的亲儿孙之外，还有几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。老人看到他们，笑得合不拢嘴，“他们待我，比亲儿子还周到呢。”

53岁的杨新明看起来文质彬彬，但鼻梁上一道不深不浅的伤疤，好像时时刻刻提醒那段伤痛——对抗敌人受的伤，失去战友的痛。“子弹从我脸颊旁飞过，擦伤了我的鼻梁。本来早就结痂了，前段时间又溃烂了。”杨新明说。

远离了战火硝烟，杨新明现在在媒体工作。当年和他一起凯旋的战友，现在也分别有了各自的事业和家庭。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，32年前，一起扛过枪的同乡兄弟。

1984年，300多名20岁左右的江苏如东籍年轻人奔赴前线，其中有18人牺牲，烈士们的骨灰被运回家乡，送到他们的亲人手中。但他们没有忘记，枪林弹雨中，对彼此嘱托：“假如我‘光荣’了，拜托你们照顾我父母。”

留在家乡的十几名如东老战友自发照顾起了烈士父母，除了平时经常上门探望，逢年过节一定会带着礼物登门，就像在外的儿女回家一样。2011年春节，几个老战友前往李华烈士家中，发现房子破旧漏风。他们赶紧联系战友们，一起筹集资金，购买了建筑材料，准备为老人重新修一座新房子。不少战友也趁着节假日赶来搭把手，抓紧时间把瓦房盖了起来。大到修房子，小到换电饭煲、修电视机，他们的关心无微不至，渗透在老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



15 | 邱勇

南京
好医生为高原孩子挣命

他拒绝高薪回国，在引进先进医疗技术的同时，还定期为特殊群体病人免费手术。

一封来自青海的信，成为2017年春节到来之际，邱勇及团队收到的最大惊喜——2016年上半年，他们免费救治的9个严重脊柱侧弯的藏族孩子，联合署名写下一封长信。他们用“获得重生”四个字来描述邱勇为他们做的一切。他们自豪又满怀感激地告诉邱叔叔：“如今，我们终于可以挺起胸膛做人了！”

19年前，37岁的邱勇拒绝高薪，毅然从法国回国，回到南京鼓楼医院，并将当时最先进的脊柱畸形三维矫形技术引进中国。邱勇的归来，使鼓楼医院的脊柱矫形技术立马走到了全国最前面。当时，全国30%的脊柱矫形手术都在鼓楼医院实施。而他自己，也忙成了“拼命三郎”，病人从全国各地涌来，最忙时，他连续上门诊12小时，连喝水和上厕所都没时间。

这个在同事、学生眼中“把自己榨得一干二净”的骨科主任，从15年前开始，又挤出时间，走上了公益路，定期为特殊群体病人免费手术。

15年前，一个来自洛阳福利院的脊柱侧弯女孩，成为这一事业的开端。因为手术费用昂贵，邱勇四处奔走，寻找慈善基金扶持，最终为女童成功手术。

如今，邱勇的坚持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，爱心企业、个人，以及鼓楼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等，都成为他公益路上的最大支持者。他和团队救助的对象，也从东部福利院孩子等特殊人群，扩大到了高原少数民族的青少年。



16 | 薛松夫妇

南京
公交夫妻坚守一条公交线

一条公交线，一对公交夫妻，一跑就是10多年。

南京的公交，有上百条线路上万台车辆，其中夫妻档的公交司机也并不少见。但是，一条公交线路，仅有的一对夫妻就是薛松康和康有花二人，就“承包”了这样一条特殊的公交线。

从清晨到夜晚，这条穿越南京泉水村的7公里路，来来回回，就是这对恩爱夫妻的全部生活。而他们，也成了泉水村村民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康有花和丈夫分了早晚班。由于每天的末班车是晚上8点40分开出，结束后，薛松还要再开回场站，检查检查车辆，回家已经近10点，那时妻子康有花早就睡了，因此，10多年来，夫妻俩基本只有靠中午短暂的交接班时间，说上几句话。

车况怎样，哪段路不太好走，虽然只有20来分钟，这对认真的夫妻，往往开口的第一句话还是工作，在交代了车辆的基本情况后，两人也会趁着这一天中唯一的交流时间把家里的事互相嘱托下，“厨房那个灯坏了，你去修下。”“女儿明天要开家长会了，你能去吗？”薛松回忆，除了工作，两人说得最多的就是孩子，特别是女儿小的时候，作业哪道题不会了，两人都是在交班的时候告诉对方。

10多年下来，村民早都认识了他俩，平时见面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薛哥和康姐，夫妻两人说，村子里老人多，看到腿脚不便的老人，他们都会去扶一把，扶到座位上再起步，看到有人远处跑过来，他们也都会等一等。

说起薛松和康有花，“老乘客”们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，“我就是为了这条线，为了他们夫妇，才买的这里的房子。”59岁的韩顺英说，“坐他们的车就跟坐自己家孩子的私家车一样，特别温馨。”



扫描二维码点赞投票赢iPhone7大奖